

第一编

引言

► 约瑟夫·拉彼德

文化之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回归和启程

1

Culture's Ship: Returns and Departur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Yosef Lapid

在 20 世纪末，文化和认同令人注目地重新呈现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中，相关的人类学者已经开始体验“被其他学科帝制化”的古典珍藏（即文化和认同），他们都关注到这一趋势（Fox, 1991:13）。然而，针对这些概念的学科之间辩论十分激烈，而且辩论者们似乎也都确信事关重大，不容忽视（Bremer, 1990）。

考虑到文化和认同没能在国际关系学领域最近的“辩论”中扮演突出的角色（Millennium, 1993:375），所以当它们开始高度重视该辩论结果的时候，还是很让人惊讶的。但是，在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理论的建立中，偏向文化和认同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趋势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划分，它还包含着主流正统理论和重新确定的批评意见（Linklater, 1994）。政治现实主义者——受华尔兹转向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他们一直严格地排斥文化和认同——正在慎重地参与到这种趋势中来（见本书第六章）⁽¹⁾。同样的，在经历对“观念的解释”不友好的漠视之后，“观念”时代又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经济学中（Jacobsen, 1995:283）。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把文化作为“最后的解释求助”的外交政策分析家们，现在也似乎坚决地“转向外交政策中文化作用的研究”（Hudson, 1995:2）。

因为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研究兴趣都集中在解释国家的“社会性”，他们的研究方法日益集中到国际事务中文化

和认同的建构作用 (Caporaso, 1992; Zacher and Matthew, 1995), 最近国际关系学科的表现充分反映了这一倾向——例如阿尔克 (Alker) 的“人文主义”(1992) 和凯格利 (Kegley) 的“新现实主义”(1993) 阶段——而且欧洲和北美的研究方法也涉及这一趋势 (Hurrell, 1993)。无论怎样, 尽管大部分主流观点只是在最近才不得不开始承认文化和认同的重要性, 但是反思主义 / 建构主义 / 后现代实证主义 / 后现代主义 / 后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挑战者们的精髓, 它们都来自对文化和认同因素的孜孜以求。因为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国际关系学科的批判边缘, 从而对加强针对文化和认同的再定位予以极大的支持 (Darby and Paolini, 1994:384)。

任何人都不需要孤注一掷地为国际关系领域内文化和认同互为例证的利益寻求什么貌似合理的解释。两个戏剧性的转变——一是全球范围内的转变, 另一个是国际关系学理论的转变——相互作用并影响到这一大受欢迎的倾向。从前者开始, 随着冷战的突然结束, 独立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爆发, 这直接地、并且不可避免地迫使国际关系学者团体重新思考世界事务中文化和认同的理论地位。⁽²⁾可是, 在更大的规模上, 国际关系学科似乎也回报以更广泛的理解, 认为“一个新的、以某种方式极度全球化的时代正在产生”(Buell, 1994:2)。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 在深刻的、划时代的动荡时期 (Rosenau, 1990b) 当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转变似乎比地缘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变化更快的时候, 国际关系学科同样应该重新设定理论的和经验主义的焦点, 这是正常的, 也是正确的。

可是, 以现实为基础的解释完全没有为国际关系辩论中出现的、文化和认同的向心性提供完整的理论。例如, 扩大民族冲突层面的倾向稳固地建立在 20 世纪 60 年代 (Gurr, 1994:15)。国际关系学科用了整整 20 年时间来承认这个倾向, 这和现实没什么关

系，而是和当时国际关系学术领域发生了什么是有关的 (Moynihan, 1993)。⁽³⁾ 因此，我们必须用不断的论证和推理来补充以现实为基础的解释，而论证和推理适当地关注到国际关系中慢慢变化的社会科学的敏感性。

近年来 除了冷战结束、向新的全球化时代转变以外 也可以看到，国际关系学科充满了批判的细致研究 (Lapid, 1989)。大多数较为集中的批评挑战并没能使主流的正统理论屈服，但是开创了国际关系学中比较理性的和社会学的灵活性 (Sjolander and Cox, 1994:5)。在我看来，文化和认同的回归是国际关系领域中“坚定的、理性开放的时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Latham, 1994:8)。

这本书将探讨一些方法 如果使用这些方式 对文化和认同的丰富理解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全面理解全球的动态。基本原理提出了研究中的文化和认同这两个术语的向心性可能，也形成了深刻地获得新生的国际关系理论方案。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基本原理 接下来的分析顺序是这样的。首先 我把文化和认同的“回归”设定在最近国际关系理论化过程里“活动”的语境中。其次 我提出了公认的文化和认同观念中最近的范式转换术语解释。然后，我说明了理论发育的策略，它使我们了解到这个论文集所采用素材的、独到的切入点。最后 我说明了本书的构成 并把每个作品都和更广阔的“整体”背景联系起来。可是 需要提到 我在发展这个原理时呈现出的个人观点，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本书的编者共有的 但它们绝不够完善。退一步说 引言中介绍性的全面评述是这部合作结晶的所有参与者共有的。

运动：国际关系理论化中的“转变”和“回归”

在政治不确定、理性不确定的这些时期，对新的学科趋势感兴

趣的人不会忘记，鼓吹的理论进步呈现在国际关系学者共同体的方式中。近些年来，“活动”、“转折”和“配置”已经普遍成为理论进步的、动态的和有远见的涵义。比较起来，“回归”似乎是被动的，而且引发了对几乎是“选择性记忆缺失”驱使的、怀旧的曲折映象（见第十章）。面对这种背景，在前缀的微妙斗争中，“re-”表示‘又再’之义]像在再思考（rethinking）、要求归还（reclaiming）、再定位（reorienting）、回归（returning）等中]近来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胜利，战胜了“post-”（表示‘在……后’之义）]像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等中]。在我看来，这个表面上的命运变化是真正的社会研究[(re)search]观念中认真地再考虑（reconsideration）“re-”时刻的局部。更加引起争论的是，这个再考虑引起了严重的误解和不必要的诽谤，被认为是运转良好的社会科学方案中超分析（meta-analysis）的功能就是“二阶（second order）”的研究]（见第六章）。

不管怎样，关于文化和认同只能用“回归”来描述。因为按照我们的比喻，文化之舟明显不是第一次驶进国际关系的理论视线。和在其他的社会科学内部一样，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文化在国际关系理论和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Alexander and Smith, 1993:151）。即使是在后来，文化之舟被迫驶回外海的时候，它的一些“承载”也在继续发扬光大，而其敌对学科的核心并没有发现这一点。简而言之，如果误解国际关系学中“革命运动”的回归就会因小失大。除了纠正历史记载以外，“回归”观念还是一个及时的暗示，暗示我们，在国际关系的理论方案中，即使再一次可以接近文化之舟，但岸上也还有重要的学科优势值得重新发现、恢复并复兴。

但是，“如果文化和认同问题一直是我們分析的社会世界中的

重要部分(见第十一章)那么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即便要相信,我们正在面对的新情况,是永恒回归的、规律周期中的任意移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在接近一个新的汇合点时,文化和认同或者国际关系理论都未必是同样的。而且在充分改变的情况下,物化 to materialize 是注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先前的遭遇可能没有正确预示当前集合点中承担的、理论成长的潜力。

约翰·肖特(John Shotter)说,“在初期的世界本性的深刻思考中 我们有一种选择 或者考虑到它是以恒定性 固定的实物 为基础的,并且把变化看成是有问题的;或者认为它是不断变化的(就像行动中存在的),而且把达到的稳定性看成是有问题的”(1994:74)。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关系理论方案都忽视了这个选择,差不多专门致力于前一个可能性。可是,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1995:9)把划时代的时刻生动地描述为“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 和凡尔赛(Versailles) 横冲直撞”在划时代的时刻,国际关系把宝都压在稳定性和连续性上,这一点可能需要重新认真考虑一下。因为,如果国际政治的博弈不只是一个传承形式的自动循环——而且 如果达到“形式”的稳定性是一个十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会要求当前国际关系学的解释——这场赌博的逆转,或者至少双向的赌博策略(dual-track betting

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历史上莱茵河以东、德意志中西部的公爵领地。公爵领地开始于12世纪,在以后的许多世纪中由教会诸侯统治,尤其是由科隆大主教统治。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议(1648)标志着“30年战争”的结束。在1807年拿破仑攫取了该地区,并把其中的一部分定为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由他的兄弟热罗姆统治。此地区在1815年后成为普鲁士的一部分(译者注)。

凡尔赛(Versailles),法国中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巴黎西南。该城以路易九世于17世纪中期建造的宏伟宫殿而闻名,1919年于此签订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条约(译者注)。

strategy) 就可能会成为迫切的可取选择 (Cox, 1992)。在后一个部分中, 我将把这个方向的见解与我们对文化和认同的、变化的理解联系起来。此后, 这部分将把这个观点延伸到冷战以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化的领域中。

成为定义性的摩擦: 微调的文化和认同

迄今为止, 一直都认为文化和认同的核心内涵和关系都是不言自明并毫无疑问的。这简直就不是个问题。即使那些铭记文化和认同概念的理论承诺的人, 也在某种基本的意义上一直在警告说, 这两者是“不可信的”(Jepperson and Swidler, 1994: 360; Handler, 1994: 27)。⁽⁴⁾在这个意义上, 一些定义性的微调 (fine-tuning) 会使我们的辩论进入更激烈的焦点。

话虽这么说, 可是, 我们的任务既不是要冒险进入概念的沼泽, 继续使考虑中的两个术语陷入困境; 也不是要通过明确限定“操作定义”完全回避这个沼泽。因为问题并不在于缺乏潜在有益的、但武断的简化, 而是要深思熟虑地提出同公开的理论使命相匹配的优势定义。

我们记得这些方向性的观念, 注意到文化和认同的核心内涵在近些年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类似的重新定义。尽管形成的多重性和流动的不稳定性使传统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都站不住脚, 可是其目的却是要使文化和认同与多重性及不稳定性能够更加协调一致。我们也注意到, 对于多重性和不稳定性这一方面, 日益流动的、混合的和多民族的世界使国际关系的难点越来越多。尽管这些新奇的、混合的和多民族的世界使国际关系的难点越来越多, 尽管这些新奇的、混合的和多民族的世界使国际关系的难点越来越多, 尽管这些新奇的、混合的和多民族的世界使国际关系的难点越来越多, 尽管这些新奇的、混合的和多民族的世界使国际关系的难点越来越多, 但是传统的叙述只会掩饰这个问题, 并使其进一步地恶化。

乔治 (George) 和路易斯·斯宾德勒 (Louise Spender) 很敏锐地指出 [在他们给托马斯·菲茨杰拉德 (Thomas Fitzgerald) 所著的《认同的比喻 (Metaphors of Identity) 》写的序中] 对多样性的理解和普遍深入的建构主题是支配当前社会理论中重新思考文化和认同的两个主要主题。在这些主题的影响下, 新的理论倾向于突出迄今为止一直忽视或者否认的文化和认同范畴, 例如, 它们社会建构的 相对于原生给定的 本性 它们随意的 相对于确定的 范畴 它们分段的 / 多样化的 相对于一体化的 / 同质化的 涵义 和它们多面的 / 动态的 相对于线性的 / 静态的 特征。

当前的重新思考彻底地把文化从具体的单一概念改造为有一个更多细微差别的、微调的语义场 (semantic field) (Jepperson and Swidler, 1994)。它拒绝 “一致的文化整体” 的迷信 (Herbert, 1991:3) 和 “莱布尼兹 (Leibnitz) 单子 (monad)^②” 的比喻 (Fleischacker, 1994:122) 这些迷信和比喻趋向根据界限、同质和自然的永恒性详细阐述文化。而且它还鼓励针对文化综合性描述的怀疑论, 综合性描述的文化有 “生活方式”、“无动于衷的行动者”、“高级的组织者”(Van de Vijver and Hutschemaeker, 1990: 5), 或者社会行为的文化。

关于认同的重新思考也遵循了类似的方式。“多样性”和“社会建构”的联合主题对占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提出了疑问, 而稳定性和连续性至今一直都在描述着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理查德·汉德勒 (Richard Handler) 指出, 200 多年来, 最有影响的西方的讨论都把群体描述为自然世界中有界限

莱布尼兹 (Leibnitz) (1646—1716) 德国自然科学家、哲学家 (译者注)

莱布尼兹学说认为单子 (monad) 是构成物质世界存在的、最基本的和不可分的单位 (译者注)

的客体。比较而言，“现在对集体认同的学术分析中，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认同是本质的、基本的、整体的并保持不变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认同是通过历史上的行为建构并改造的”（1994:29）。

信奉文化和认同是突然出现的和建构的（而不是固定的和天生的）是竞争的和多形态的（而不是整体的和单一的）是互动的和像程序的（而不是静态的和像本质的），这会导致开创性的理论进步（Somers, 1994）这种见解形成了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直觉的想法——完全成形的、稳定的行为体创造并再造了可预见为稳定不变的世界——也许在严重地误导我们。这种见解也促成了对所有文化体系中的异质和矛盾更加敏感（Wolf, 1994:7）。我们必须记住集体的形态多种多样简单地把它们重新标明为‘认同’或者‘自我’（而不是作为国家、种族的划分、民族、文明社会等等）最多也就是一个有希望的开端，仅仅是社会研究中与具体化斗争所取得的一个可接受的成就。

重申一下，这个定义附录的要点是要突出风险，国际关系理论没有相应地摆脱对这些概念的绝对的、本质主义的和整体的理解，而是转向文化和认同，这就会涉及这些风险。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例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有影响的“文明冲突”的论文正好描绘了这种失效的运动组合，这就表明了这一点。一些针对他的批评家们（Rubenstein and Crocker, 1993:115; Shapiro, 1994:495）注意到，亨廷顿大致脱离了政治现实主义中声名狼藉的国家中心主义，不料竟会在他后来转向预先给定的文化行为体的、具体世界的时候，又恢复了先前脱离的理论，即预先给定的文化行为体具有天生的冲突利益（就是说，文明）。亨廷顿的失败完全不是什么特例，他的失败只不过明确了这一点：“具体化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不容易克服，因为它遍及我们科学世界观

的、修辞上和概念上的基层结构”(Handler, 1994: 27)⁽⁵⁾。

迄今为止，我们微调的工作一直集中在我们对文化和认同的核心理解的类似转变上。可是，尽管历史实践和当前实践都关注认同和文化，但文化和认同并不是同形的(isomorphic)^①。尽管文化很有代表性地提供了描绘认同群体所必需的符号素材，但认同群体并不总是构成单独的文化(Fitzgerald, 1993:190)。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因为每个认同都为个体或者社会履行着不同的重要功能，认同常常是保持不变的”，但文化可能会改变(同上：194)。

如果文化和认同完全不能互为基础，那么文化—认同关系的本性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著述很多，但都没有一个权威的回答(Edwards, 1994)。有些是把文化概念作为优先考虑，而其他的则更贴近认同(Fitzgerald, 1993)。⁽⁶⁾例如，托马斯·菲茨杰拉德把文化看成“一个框架 框架内的人们推断出自己是谁、应该怎样行动 还有要去什么地方”但是他承认“因为认同是‘为了对付特殊环境 根本上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是‘执行的角色’。因而 认同成为‘文化的行动单位’(同上：186)⁽⁷⁾。

站在这本书的立场上，就没有必要把文化—认同关系还原为单一的恒定公式。再进一步地说，就是要突出文化—认同关系的复杂性，并且表现出这两个改变是怎样以有趣的方式回应正在进行的国际关系学辩论的 例如 结构—行为体或者无政府状态—等级状态的辩论。这个评论使我们直接进入到基本原理的后一个部分。

同形的(isomorphic) 具有类似的结构或外表 但世系不同(译者注)

驾驭回归：使“文化的”和“科学的”和谐一致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呢？对于牢固的、被鉴定知识的集合来说，有些人相信单一的、高标准的、容易接近的实现手段“科学的方法”）他们努力使自己的这个信仰保持不变，乍一看，他们似乎最有资格制订这个课目的计划。他们认为最能产生效果的必修课课程最有可能包括以下几点：在过去，我们一直怀疑不失去——或者严重地妥协于——科学的同时进行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现在，我们认识到，文化研究中的度量问题 and 经济学、地缘政治学研究中的度量问题一样容易处理。先要迅速地放弃形而上学的主张，这些主张认为文化和认同与经验主义的实证有关系 这些实证包括：“它们如何要紧、还有社会科学家能怎样系统地研究它们的影响”（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3:6）。特别要突出两个规则：第一，要和二阶就是超理论的（metatheoretical）分析的“炼狱”保持安全距离 第二 要迅速地汇集在单一的、学术工作的典型上，也就是，汇集到正式的阐述和对因果关系假设的经验主义检验上，而正是因果关系的假设把文化 / 认同 / 观念和行为结果联系起来的。

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合理的经验主义尺度，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似乎没有必要遵循使国际关系中文化和科学和谐的、实证主义 / 经验主义 / 行为主义捷径的惟一有效性，或者对这种成就的超理论反映的枝节问题。在国际关系学中，像在其他学科里一样，要成功地融合文化和科学，这就要求明确理解历史语境和最初使文化和科学不相容的学术实践。还有，当然在历史的和理性

用以阐明某一或某类理论而本身又更高超的一种理论（译者注）。

的时刻 当文化和科学都变化不定的时候 为了使它们和谐而采用严格的、避免超理论的策略，会造成深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误解。⁽⁸⁾

有二个意见似乎特别告诫了对第一秩序 / 实证主义 / 经验主义模式的不成熟应用。第一，这样一种理论会导致“中心易变的模型”，这个模型在近些年遭遇了激烈的挑战（Abbott, 1992: 435）。第二 我们过去应用到文化和认同的“可变方法”的经验 已经彻底让人失望了。⁽⁹⁾ 还有第三，因为实证主义的 / 经验主义的霸权本身经常被用来当成解释排斥文化和认同的罪人（Misra and Gergen, 1993: 225）所以 有人可能会怀疑 用这种方法解决当前文化—认同的和解可能不够谨慎。

的确，作为回报经验主义作用的前奏，我们需要更清楚地理解 国际关系学者通过驾驭文化和认同 进行探索知识的研究 实际上会希望更好地解决什么类型的知识问题。作为这一节的提示，我将简要地介绍这三个问题。关于这三个问题的讨论可以让我们预见到 国际关系学理论中达成的、文化—科学的复兴成就之后的重大进展。

国际关系学者现在正在精力充沛地开垦着文化和认同，以回应他们面临的日益增加的、全球异质和差异的难题 我相信 这既具有讽刺意味 也是明显的事实。说它具有讽刺意味 是因为作为“在……中间(inter-)”类的学科长期一直受政治现实主义的控制，所以国际关系学领域应该有双重的准备去应付差异的问题。可是，近来的事件已经表明国际关系学没有包括在亚国家和超国家层面上、结合和瓦解的、大量增加的并且共同出现的动态。好像国际关系学对主权国家状态的迷恋降低了它对付种族民族状态和政治他者状态中复杂问题的能力。结果，国家关系理论方案现在必须重新给自己定位，转向复杂性和流动性层面上的、动态的

重性。

始关注再造的世界本体论，这并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见第六章）。但是国际关系理论者为了更好地构成、描述并解释世界多样性中的新问题，已经转向文化和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可能正在从事一项能够完成的任务。这个语境中的临界值（critical）就是对多重性的强调，多重性是一个可塑造的主题，而正是这些可塑造的主题形成了当前社会理论中对文化和认同的重新思考。

对于第二个知识问题来说，回到文化和认同可能会得到有趣的解决办法，那么转向第二个知识问题，我们会遇到具体化这个问题，而且还需要重新探索国际关系学中自然和习俗之间的关系（Parmentier, 1994:175）。我们通过具体化把我们的话语转变为固定不变的对象，但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动荡的情况下，国际关系学者更多地涉及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而不是反复使用的具体化的法宝（见本书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所著的第十章）。在极端的变化中，我们的学识却主要集中在实体上，而不是过程上，主要集中在名词上，而不是动词上，这实在令人困惑。

和其他领域的同事们一样，国际关系学的学者们必须弄清楚，当我们只研究名词时，怎样才能关注到运动呢？（Dervin, 1993 51）。现在对文化和认同的关注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推动国际关系学反省歪曲的、名词和动词的比率问题。我认为，在简化不容忽视的复杂性时，文化和认同会提供无可匹敌的机会，使国际关系学的学者团体对研究现实的、社会解释的涵义变得敏感（就像前面提到的，现实的、社会的解释是最近学术著作中第二个可塑造的主题）。

最后，第三个知识问题就是理性的隔离和褊狭。当前国际关系学理论中文化和认同的回归可能会消除或者极大地减少这个问题。当然，近些年这一情况已大有改观（Linklater, 1994:119）。在

考虑到“回归”的情况下，国际关系学长期以来的追逐游戏（catch-up game）中已经缺少习惯的时滞（time lag）^① 这个变化本身就是已经改观的例证。不管怎么样，这一点还是清楚的，即文化和认同迫切需要大量的、通力合作的相辅相成。因此，文化和认同的这种要求很可能促进国际研究与社会理论研究令人兴奋的新领域更充分地结合。

章节结构和预览

这本书涉及各个学科的成就，努力改变我们的认同和文化思想的本质，努力使国际关系中有关这些问题的学术讨论变得生动。我们承认，“没有研究文化的方法论”（Jepperson and Swidler, 1994:368）。同样，关于文化和认同，我们眼下更重视忽略活跃的多样性观点造成的风险和代价（Hermann and Woyach, 1994），而不是更多地关注是否缺少可检验假设的主体。

书中的各种观点虽称不上面面俱到，但也反映出国际关系学作为“独立学科”具有多重理论切入点的地位。虽然，以下的各篇论文几乎没有详细地阐述国际关系中可能产生的、有关文化和认同的众多疑问，但是都谈到了我们努力提高这个日益重要领域的知识水平时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因为这些论文都是对最近国际关系学文化和认同理论的评论，所以它们的重点并不是彻底抵制“主流”的见解。正相反，大部分作者都认真对待已确立的理论，就像他们对这些理论的质疑也是重新思考、推敲和重新构成理论的和经验的研究程序。而且，批评通常都是伴随着制定新研究方向的大量努力。

① 时滞（物）（两相关事件的时间间隔（译者注））

本书分为 4 个部分 (引言 第一章) 之后就是回顾国际关系中文化和认同的历史背景 (第二章)。第二部分主要关注的是与新现实主义的、批判的交锋。其中的论文 (第三、四、五、六章) 以不同的方式努力使国际关系理论中依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 “受到文化的熏陶”。第三部分, 焦点转向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文化和认同视角, 包括关于环境主义 (第七章) 女性主义 (第八章) 后现代主义 (第九章) 和常规理论 (normative theory) (第十章) 最后 第四部分对全书进行了总结 (第十一章)。

章节预览

这本书的依据就是文化和认同的重要性, 耶尔·H. 弗格森和理查德·W. 曼斯巴赫写的第二章对文化和认同的重要性进行了大量的说明。两位作者从简单的信念着手: 当科学不符合现实的时候, 就要修正科学。就像弗格森和曼斯巴赫提到的那样,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就扮演着失败科学的角色。假如这样的话, 关键问题就不再是要不要取代这个失败的知识主体, 而是用什么取代这个失败的知识主体。这个问题使两位作者面临经验主义研究中的困境, 即 “着眼于什么, 并且根据推论可以有把握地忽略什么”。

弗格森和曼斯巴赫正是基于这种困境才加入了文化和认同方案的回归, 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定义了 “为了忠诚和改变从属关系而进行的竞争, 而这些从属关系的变化创造的就是历史的内容”。无论他们因为简单的设定可能牺牲掉其他什么, 国际关系学理论者也不会希望忽视 “旧的政治从属关系的发展或者消亡, 同时出现新的政治从属关系” 的方式, 而且理论还能适用于政治实践的现实。可是忽视这种 “内容” 正是国际关系学理论者近些年的所作所为, 而且造成了可预见的灾难性后果。

第二章的目的就是既说明问题的起因又提出适用的解决方法。关于问题的起因，作者探讨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化的缺点，并探讨了固守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对大多数国际关系学理论者的、政治和科学想象的影响。关于解决方法，作者引导国际关系学理论者“全球政治涉及的是‘政体’的世界而不是国家的世界，并关注权威、认同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两位作者在6个精心挑选的案例研究中论证了这种理论的重新定位，这些案例研究表明威斯特伐利亚“相似单位”构成的、呈匀称状态的世界很难维持。有人认为，这一章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出一个以经验为基础的论点，即“真实的政治世界一直都是由分层的、重叠的并且互动的政体构成的”。毋庸赘言，当很多观察家认识到认同、忠诚和信仰的变化时，我们通常都在经历好像不知怎么就是惟一的而且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历史的提示，即“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次”，这种说法相当重要。

就抽象概念的和解析的累赘来说，弗格森和曼斯巴赫更喜欢在这组特殊历史案例研究中的轻松游历。可是，他们积极赞成文化之舟迅速回归到多重的理论小港口，这些小港口长期以来一直都接纳他们。当然，他们对文化之舟的部分“货物”特别有兴趣，他们把这部分内容富有成效地应用到不同民族国家的政体上。这一回，弗格森和曼斯巴赫发现这本书里有许多作者和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后一篇论文的作者文特是一个例外。

在第三章，亚历山大·文特遵循了高度精确的推理策略，把作为说明的理解和因果关系的解释结合在一起，把一阶（first-order）分析和二阶说明结合在一起，还把理论连续性和深刻的理论改造结合在一起。文特将自己完全置于反思主义的阵营，发展了新的理论整体，其标志就是“结构的唯心主义”。这个立场是审慎地“唯心的”，因为它强调主体间的、或者文化的，而不是物质的因素，它